

《拉丁美洲研究》创刊40周年专题

中国拉美研究70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

郭存海

内容提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拉美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停滞到恢复，及至当前的“井喷”式发展。为全面深刻把握当前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本文基于首次“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和《拉丁美洲研究》期刊40年论文数据库，从机构发展视角分析70年来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及其面临的升级，藉以反思中国当前的拉美研究、推动中国拉美研究的重建。研究发现，尽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拉美研究在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取得长足发展，然而过度的“政策导向”抑制了学术性研究的活力，反过来又限制了政策性研究的效力，以致拉美知识的生产始终无法完全满足中国社会的需求。这种差距反映出拉美知识的生产一方面存在数量上的不足和质量上的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又因重复生产而出现相对过剩，由此迫使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诸方面不得不面临转型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和学者亟待转变观念，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大力加强基础研究，既为“厚积”学术素养之谋，又为“薄发”政策研究之用。

关键词：中国 拉美研究 机构发展 政策导向 研究转型

作者简介：郭存海，法学博士，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阿根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9) 04-0001-2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下简称“拉美”）虽然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但拉美研究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步却并不晚，甚至是国内发展最早的几个区域研究之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拉美研究经历了从“碎步前进”到疾速发展的巨大变化。为全面深刻把握当前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笔者受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委托牵头组织、设计并实施了《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调研项目。同时，为摸清中国拉美研究的成果状况，笔者又对中国唯一一本专门研究拉美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研究》自1979年创刊迄今40年发表的全部学术论文逐一统计整理，辅以分析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本文所做的分析正是基于本次问卷调查和对该刊学术论文统计整理的数据库。

一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的动因、目标和方法

1949年、1979年和2019年，这三个年份不仅之于中国重要，之于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也同样重要。

首先，中国的拉美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1949年应被视为更适宜的起点^①。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系统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拉美研究70年的发展，对于中国拉美研究“重抖精神再出发”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紧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拉美研究“旧貌换新颜”。因此，1979年应被视为中国拉美研究“科学化”“学术化”和“制度化”的开端。

“中国的拉美教学与研究最早是从聚焦历史问题开始的”^②，但与开拉美研究之先河，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为主要特色的拉美文学译介一样，起步阶段的“拉美史的研究……应景性的文章过多，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足，许多研究成果高腔大调，缺乏客观性”^③，因此很难称其为学术研究。而几乎与此同步的另一大研究主题——拉美现实问题研究，“主要偏重介绍拉美国家的一般国情和政治经济基础知识……综合研究工作很薄弱，以时事与政论分析为主。很大的精力放在收集资料、国外重要文献的编译、资料收集整理”^④。之后，随着

① 王晓德、雷泳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50页。

② 郭洁：《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拉美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5期，第86-108页。

③ 王晓德、雷泳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53页。

④ 袁东振等：《中国拉丁美洲研究70年》，载周宏主编：《国际问题研究70年》，即将出版。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导致拉美研究机构遭裁撤、教学科研人员被下放，刚刚起步的拉美研究被扼杀于萌芽状态，拉美研究就此中断。因此，本质上而言，这个时期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拉美研究的“科学化”准备条件。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宣告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拉美研究的春天”也随之来临。1979 年 10 月，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在南京宣告成立；11 月，中国第一份专门研究拉美问题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丛刊》正式创刊^①；12 月，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在武汉宣布成立。5 年后的 1984 年，迄今最大的中国研究拉美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也宣告成立。至此，无论在学术平台建设，还是学术团体的制度化发展方面，拉美研究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开启了中国拉美研究的真正历史。

最后，随着中国崛起为新兴世界大国和中拉关系愈益密切，中国的拉美研究迈入新阶段，呈现“井喷式”发展。这种“井喷”既意味着生长的迅猛，也意味着发展的无序。值此《拉丁美洲研究》期刊创刊 40 周年之际，把脉中国拉美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服务和引领大量新兴的拉美研究机构向制度化和科学化发展就成为必需。

基于上述原因，通过系统摸排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及其现状，探索其发展历程，总结其成就和反思其局限，对于拉美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9 年 7 月由笔者牵头组织并主持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项目开始实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拉美研究机构的认定标准。本调查所指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是指设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且以拉美地区或拉美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机构，并不包括以下 4 类机构：（1）仅仅涉及拉美地区或国别而以金砖、新兴经济体或地区/区域研究冠名的研究机构；（2）北京外国语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研究中心，因该机构的性质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华代表处而并非研究机构；（3）民间拉美研究组织，如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因其没有科研经费和办公地址，或者没有研究职能而仅充当平台性质的民间智库或其下设机构，如察哈尔学会拉美研究中心；（4）曾经设立、现已消亡的研究机构，比如 1964 年成立的复旦大学

^① 《拉丁美洲丛刊》是中国唯一一份致力于专门研究拉美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研究》的前身，开始为季刊，1982 年改为双月刊。参见陈舜英、周俊南：《拉美所所刊的创办与发展》，载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84 页。

拉美研究室。但是，以下保持历史传承的情况仍被列入统计范畴，只是在时段上有所区别：（1）如果机构从未中断，后以新的名称运作，则以创始时间计入，比如1964年成立的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2）如果机构中断，后以新名称恢复，则以恢复日期重计，比如1978年成立的湖北大学巴西研究室在2012年更名为巴西研究中心。根据上述标准，本次调查认定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共56家，共定向发放问卷56份，收回问卷54份，其中有效问卷53份，无效问卷1份，数据统计至2019年7月。问卷调查的内容设计主要围绕三大板块：“机构基本状况调查”，主要包括机构基本状况，比如成立时间、机构性质、依托院系等内容；“研究人员状况调查”，包括研究人员数量、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外语结构、学科背景、年龄结构以及研究领域等；“研究成果状况调查”，包括学术活动次数、学术成果数量以及成果或活动推广平台等。

笔者将主要依托本次《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并辅以《拉丁美洲研究》期刊40年论文数据库，分析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

二 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特点

70年来，中国的拉美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停滞到恢复，以至近几年的“井喷式”发展。观测其发展历程并结合本次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拉美研究和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相比既有其相似性，当更有其独特的发展特征。

（一）政策导向性是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总特征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拉美研究在各方面均实现了一定突破，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点。整体而言，政策导向性仍然是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总特征，这一特征贯穿拉美研究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层面，迄今没有减弱迹象。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史研究概以“革命”为题，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研究缺乏学术性和客观性^①。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大会的贺词中强调：“应该以拉美问题研究的实际成果，为我国四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

^① 王晓德、雷泳仁：《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53页。

中央制定对外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① 受此原则指引，迄今创刊已 40 年、国内唯一一份致力于拉美研究的学术刊物“《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始终……坚持按照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选登文稿”^②。在新的时期，推动高校拉美研究大发展的教育部在其 2015 年颁布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中，开篇便明示“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③。

作为区域研究的拉美研究因政策驱动而兴，研究为政策服务本无可厚非，毕竟非中国独然，世界皆然。然而，在堪称拉美研究之典范的美国，这种政策导向性早已被释解，已在很大程度上引流至作为公共产品的学术研究。这种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看似无用的知识生产，恰恰是“无用之用”，既推动了拉美研究的科学性，又反哺了政策研究，提高了政策研究的质量。

反观中国，这种政策单一导向不仅大大限制了作为学术本身的拉美研究，而且政策研究的质量难以提高、政策影响力难以彰显。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似乎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趋势，即政策导向性的中拉关系研究正取代拉美研究。对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成立迄今举办的 28 次年会^④的主题进行统计发现，大多数会议主题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拉美“以资为鉴”；或者径直以中拉关系为主题。进一步统计发现，从 1984 年到 2019 年共有 9 次年会以中拉关系为主题，接近总数的 1/3。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自 2005 年迄今 15 年间举行的 8 次年会中有 5 次以中拉关系为主题，而近 5 年间连续三次年会（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均以中拉关系为主题。甚至以拉美史为志业的中国拉美史研究会，其年会主题也渐次演变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现代化、全球化，以及中拉关系。^⑤

^① 徐世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载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89 页。

^② 陈舜英、周俊南：《拉美所所刊的创办与发展》，载刘国平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国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84 页。

^③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教外监〔2015〕4 号，2015 年 1 月 26 日，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8/201502/xxgk_183702.html。〔2019-07-20〕

^④ 从 1984 到 199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每年举行一次，此后每隔一年举行一次。详情可参阅 <http://ilas.csn.cn/lmxh/nhxshybd/>〔2019-07-18〕

^⑤ 韩琦：《大陆高校的拉美研究及与台湾高校合作的前景》，载《拉丁美洲经贸季刊》（台湾），2017 年 6 月第 29 期，第 10 页。

这种拉美研究的“中拉关系化”趋向潜藏着一系列的隐忧。首先，在中拉关系研究中，对整个地区的宏大研究多，而对单个国家的深刻分析少。其次，在国别研究中，聚焦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者居多，而从跨学科视角关注国别不同层面者寥寥。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着力于文献分析和“闭门思策”者居多，而走向田野、参与式调研者罕见。事实上，这几乎是政策单一导向的拉美研究难以逃脱的“陷阱”。不唯如此，这种拉美研究发展的总特征还表现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体现在各个层面。

（二）拉美研究机构的发展节奏同重要的政策节点一致

在最近20年里，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尤其迅猛。根据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问卷调查，从1961年第一家拉美研究机构成立到2019年7月，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迄今已有56家（见图1）。其中2000年之前成立并存续至今的拉美研究机构仅有4家^①，超过92%的机构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成立的；而在21世纪成立的52家拉美研究机构中，仅有8家是在21世纪头10年成立的，2011年（含）之后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有44家，其中又有一半以上（33家）是在最近5年（2015—2019年）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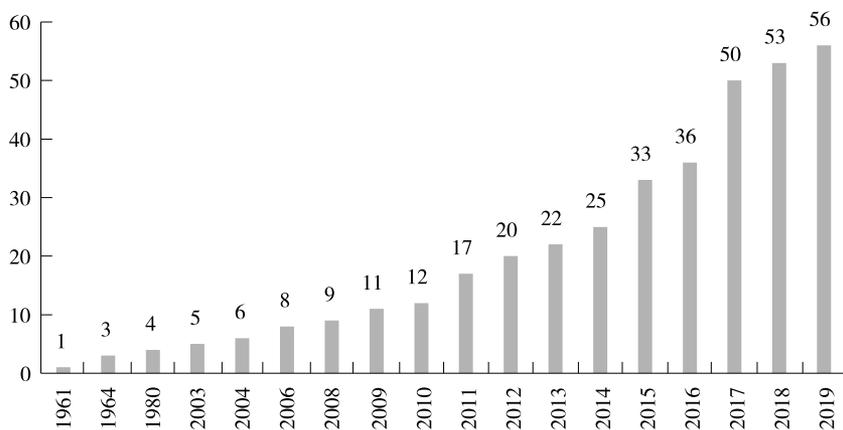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1949—2019年）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②，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① 一些较早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因后继无人而逐步萎缩消失，比如1964年成立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后划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室）2011年后不复存在。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按实际认定机构56家进行统计，而非有效问卷数量，以反映中国拉美机构的总体增长态势。

新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绝大多数设在高等院校，这同教育部启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计划密不可分。2011 年，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有条件的高校加强相关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①。教育部随后开始制定国别和区域研究行动计划并于 2012 年召开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宣布成立首批 37 个国别和区域培育基地，其中包括两个拉美研究基地。2015 年和 2017 年教育部相继出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②和《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③，借以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培育新兴交叉学科，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④。受上述政策因素的直接驱动，高校拉美研究机构疾速发展。从 2011 年开始，拉美研究机构的增速尤其迅猛（见图 2），年均增加 5 家，特别是 2015 年增加了 8 家，2017 年增加了 14 家，除此之外的其他年份也基本保持年均增加 3 家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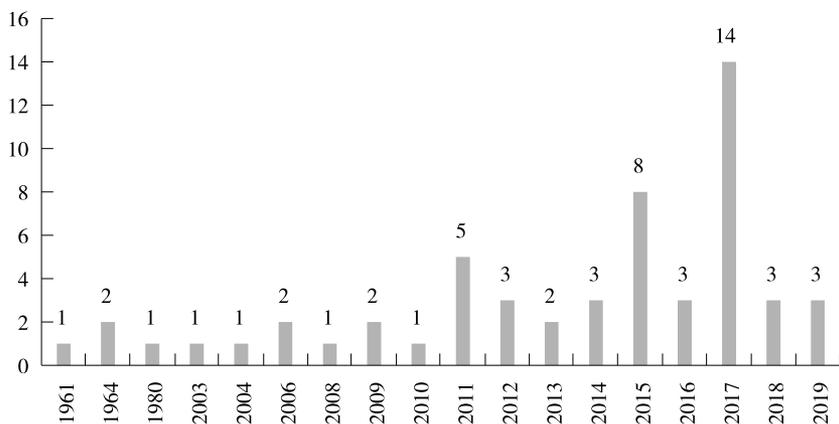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年增量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① 刘延东：《坚持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开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在 201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1 年 2 月 24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102/t20110224_115216.html。[2019-07-15]

②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教外监〔2015〕4 号，2015 年 1 月 26 日，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8/201502/xxgk_183702.html。[2019-07-20]

③④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厅函〔2017〕8 号，2017 年 2 月 23 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703/t20170314_299521.html。[2019-07-28]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成为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的加速器。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于2015年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拉美不仅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而且是“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①这种表态正式确认了“一带一路”和拉美的关系。此后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有19个拉美国家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协议，占拉美国家总数的近60%^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亟需有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知识支撑，这对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为拉美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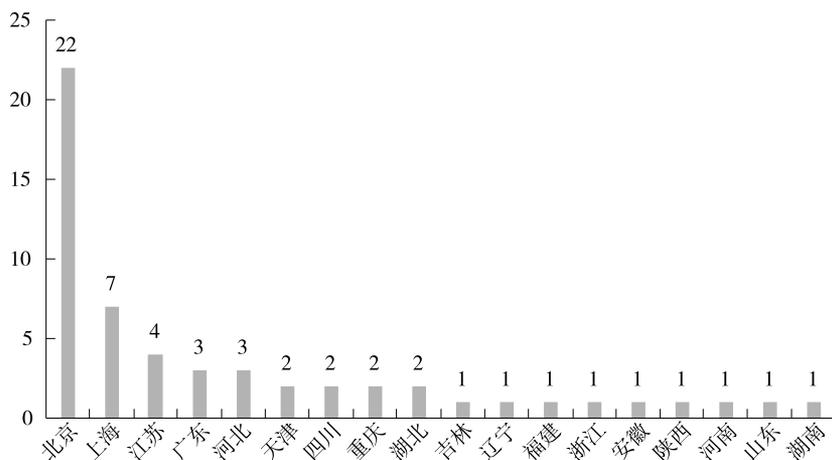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拉美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也体现出相应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特点。从图3可以看出，目前拉美研究机构已经覆盖至全国18个省市^③，其中仅北京一地，就高达22家；上海次之，但也有7家集聚。也就是说仅京沪两市的拉美研究机构就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这种地理分布既同京沪的政治和经济的地缘优势相关，又同其国际大都市定位及优质高校大量集中相关。紧随京沪两市之后

① 郭存海等著：《“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机遇与新挑战》，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VI页。

② 郭存海：《“民心相通”推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跃入新境界》，光明网理论频道，2019年4月25日，http://theory.gmw.cn/2019-04/25/content_32778646.htm。[2019-06-26]

③ 这里的统计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的是江苏、广东和河北。个中原因或是，江苏和广东两省同拉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亟需相关知识和政策智慧的支撑；而河北目前是同北京联系紧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同拉美有密切合作的地区都有了拉美研究机构，以满足地方发展对拉合作的需要。

（三）机构性质“虚多实少”限制了拉美研究的发展潜力

尽管在过去 15 年间，拉美研究机构增长了 833%，达到 56 家，但对这些机构进一步细分发现，“虚多实少”是其本质特征。机构繁荣并不意味着研究繁荣，机构的性质和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源配置，进而影响拉美研究发展的潜力。通过对全国 56 家拉美研究机构的摸排发现，只有 17 家也就是 30% 的拉美研究机构属于实体（见图 4）。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人、财、物等硬件方面的资源配置上能够得到一定保障，从而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对较好的基础设施环境。相对而言，其余 39 家是非实体，即约 70% 的拉美研究机构在争取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就面临挑战，这无疑会影响拉美研究的动力和成效。

高校可谓是中国拉美研究的主力，也是增量最集中的来源。在 56 家拉美研究机构中，共有 50 家属于高校研究机构，占比接近 90%。因此，有必要对高校系统的拉美研究机构做一特别分析。第一，从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基地的人选情况来看（见图 5），只有 2 家（占 4%）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于 2011 年第一批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培育基地名单，另有 19 家（占 38%）在 2017 年成规模地进入备案基地名单；与此同时还有 29 家，也就是说接近 60% 的高校拉美研究机构既不属于培育基地，也不属于备案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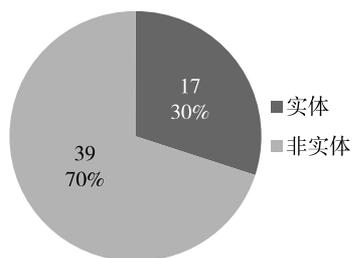


图 4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数量及其比重：按机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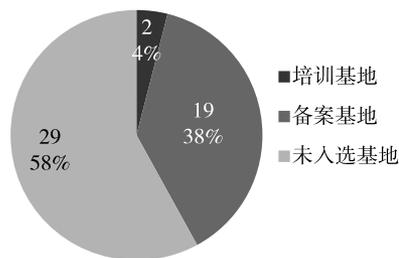


图 5 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基地的拉美研究机构数量及其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第二，拉美研究机构的建设有 43% 属于校级科研平台，是占比最高的（见图 6）。这种校级机构大体包括两类：或者是实体，无须依托其他院系；或者属于“低职高配”，即虽是校级平台，但其发展仍主要依托外语类院系或

国际问题类院系。除此之外，高校拉美研究机构所依托的院系依次是外语类院系（21%）、国际问题类院系（13%）、经管类院系和历史类院系（均为9%）等，还有少部分机构则依托民族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这种分布对其研究领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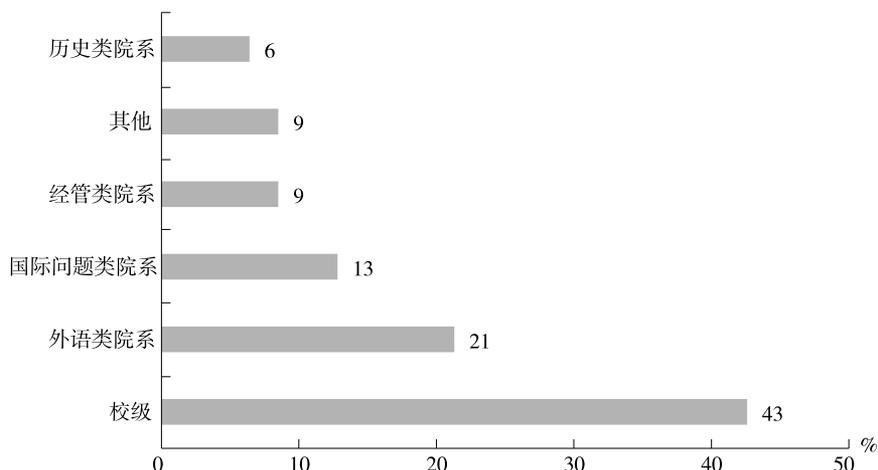


图6 中国高校的拉美研究机构分布：按依托院系^①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研究机构的性质及是否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或备案基地名单，会影响高校对拉美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在返回的53份有效问卷中，只有25家机构（占47%）有年度预算，一半以上的机构（28家）没有年度预算^②。年度预算的缺失通常意味着难以进行科研规划，科研的可持续性就成为问题。对有年度预算的25家机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年度预算的分布情况。如图7所示，凡是拥有年度预算的拉美研究机构，有44%的机构预算额度在20万~30万元，或者更高。尽管如此，仍有28%的机构的年度预算额度在10万元以下。而在无年度预算的拉美研究机构中（见图8），有近80%的机构，年度经费低于20万元；有一半以上（54%）的机构年度经费不足5万元。由此可以看出，缺乏预算通常意味着资金不足或者影响可持续供给，进而影响着拉美研究的动力和成效。

^① 此处数据仅包括返回有效问卷的53家机构。

^② 有预算意味着稳定化和制度化的资金支撑，通常在上一年制定预算金额和开支范围；而无预算则意味着拉美研究经费无法获得制度性保障，但无预算并不意味着没有资金支持，差别在于“无预算”情况下组织的学术活动或课题支出通常需要临时申请，额度也受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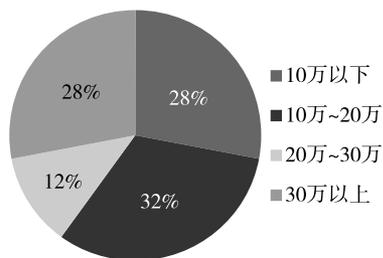


图7 有预算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
比重：按年预算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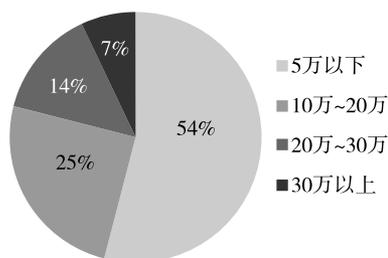


图8 无预算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
比重：按年经费额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四）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对提升，但结构有待优化

与2000年之前相比，无论在学历层次、外语水平，还是在学科背景等方面，当前拉美研究人员的整体素质都得到了明显提升，但其结构仍有相当的优化空间。

首先，全职和兼职人员结构失衡。在中拉关系趋热和前述系列政策驱动下，出现了拉美研究机构的“大跃进”，但支撑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同步跟上，毕竟人才培养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些机构尽管没有任何研究基础或者相关研究人员，或者被“拉美研究热潮”所席卷，或者主动趁机挂牌占坑，甚至径直挺进了备案名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何仅2017年就新增拉美研究机构14家。这就导致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一种“怪状”：极个别机构甚至“只挂牌不挂人”或者“只挂牌挂人头”，相对好一些的机构采取“全职+兼职”的办法来应对当前研究人员不足的尴尬。有些机构完全靠兼职人员支撑，带来的关键问题是：一些兼职研究人员实际上是“兼而不职”，以致多年没有什么学术产出。针对46家给予有效反馈的研究机构的统计发现^①（见图9），在申报的全部552名研究人员中，全职研究人员仅占30%，为163名；兼职人员高达389名，占比70%。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剔除6家^②非高校智库的全职研究人员62名之后，每个高校拉美研究机构的全职研究人员平均不足3人，其中有13家机构没有全职人员。

^① 个别接受问卷调查的机构或许误解了全职和兼职的根本区别，以致填报数据与事实差距较大，因为这与其填报的科研成果数量完全不相容。这里剔除了那些全职数量奇高而与事实不符的研究机构，仅保留相对有效的46家机构。图12—图14均基于46家机构的调查数据。

^②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所拉丁美洲史研究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美洲和大洋洲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

其次, 研究人员的学历、职称和外语结构整体相对趋好。高学历、高职称和较高的外语能力是开展高质量拉美研究的基本条件和基础保障。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比较来看, 当前拉美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的表现总体趋好。

就学历层次而言, 有一半以上(54%)的研究人员拥有博士学位, 33%的研究人员拥有硕士学位, 还有13%的研究人员只拥有学士学位(见图10)。这说明, 尽管拉美研究人员总体上拥有相对较好的学历基础, 但仍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面临提升其学历层次的迫切需要。不过, 这种结构相较于2000年以前已有很大改善, 而且相较于西班牙语师资的学历结构, 仍胜一筹。根据郑书九教授的统计^①, 2018年在全国高校799名西班牙语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在读的比重仅为32.1%, 而将近70%的教师仅拥有硕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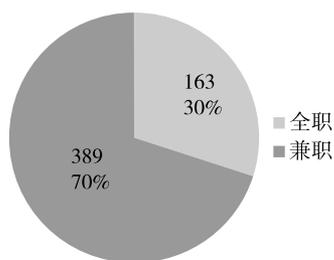


图9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全职/兼职研究人员的数量及其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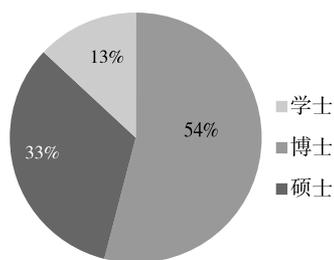


图10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学历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2019年。

拉美研究人员的职称结构也大致如此(见图11)。拥有教授/研究员职称的研究人员占比28%, 副教授/副研究员达24%, 两者合计占比52%, 合计超过一半的拉美研究人员拥有高级职称, 这一比重远高于西班牙语师资情况。2018年, 拥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西班牙语师资分别只有4%和10%, 合计不足15%^②。不过, 拉美研究人员和西班牙语师资在中级职称结构上, 拥有大体相似的比重分布, 分别只有43%和53%。这充分说明, 拉美研究人员的职称结构虽然优于西班牙语师资, 但仍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

外语能力是满足拉美研究的基本需要。外语能力是从事区域研究的基本能力, 而懂英语, 特别是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是深入开展拉美研究的必备技能。从当前的外语能力结构来看, 尽管仍有提升空间, 但已经大大改善了,

^{①②} 郑书九主编:《全国高等院校西班牙语教育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以及郑书九教授对该报告的后续更新数据。

初步可以满足从事拉美研究的基本需要。调查发现，接近一半（47%）的拉美研究人员懂英语，而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比重分别占 21% 和 7%；而能够熟练使用两种外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英语和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比重也达到 25%（见图 1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应当是研究人员在掌握英语的前提下，另外掌握一门研究对象的主要语言——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这应当是从事拉美研究基本的，或许也是最高的要求。目前来看，距离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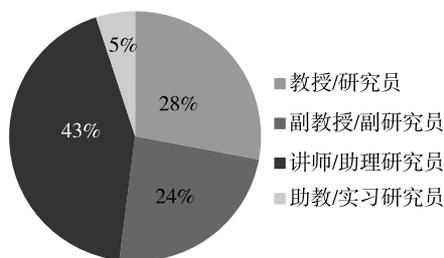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职称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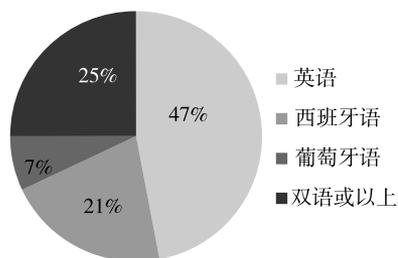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拉美研究人员的外语能力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拉美研究人员年龄结构优化，人才断层大大缓解（见图 13）。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当前中青年已经成为拉美研究的主力，此前曾出现的拉美研究人员年龄结构断层得到大大的缓解。30~49 岁的青年研究人员占比超过 61%；其中 30~39 岁占比最高，达到 34%；40~49 岁占比 27%。这种年龄结构为拉美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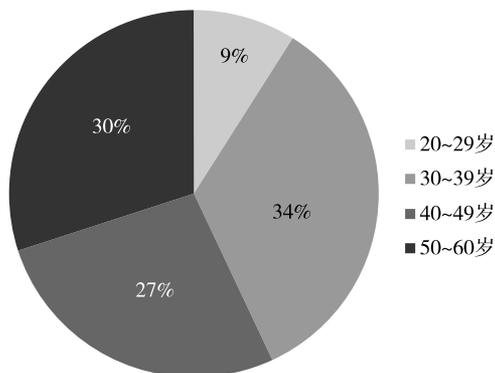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拉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从传统类别日益向多元化趋势转变。传统上，拉美研究人员大多出身于外语、历史和（国际）政治等学科，由此限制了拉美研究的跨学科和综合研究能力，客观上也难以满足拉美研究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青年有生力量的持续加入为拉美研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推动着拉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见图14）。首先，文学和法学^①占据优势的传统没有明显改变，当前仍位居前列，分别为33.5%和26.4%。不过，传统上居优的历史学科的地位相对下降，占比只有13.0%。其次，经济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作为新兴力量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或者成为新的力量补充，比如经济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占比达到18.7%，而教育学和管理学也占有一定位置，分别占比1.4%和4.0%。这大大丰富并更新了拉美研究人员的传统学科背景，从而也有利于优化拉美研究的内容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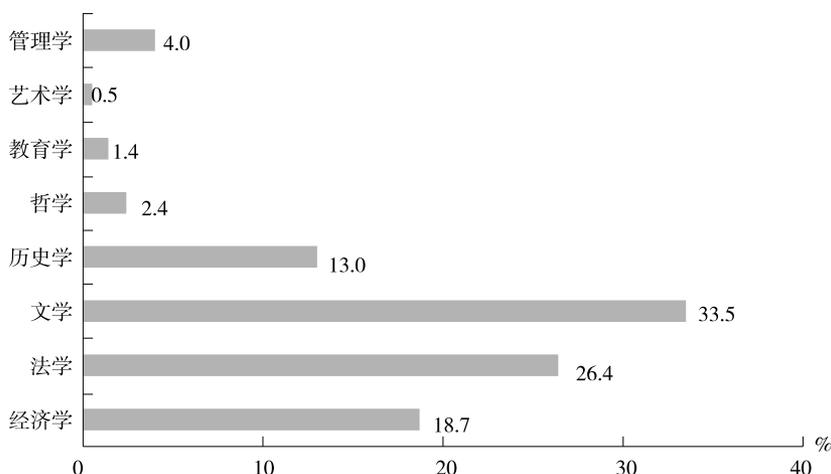


图14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学科背景的日益多元化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根据受调查机构的填报资料（见图15），尽管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依然是传统的三大研究领域，分别占比13.0%、14.9%和15.8%，但此前相对缺乏研究的

^① 学科背景的问卷设计基于学科门类，这里的法学主要指其下所涉一级学科政治学（0302），主要包括8个二级学科：即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

领域也开始获得新的关注，比如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分别占比 12.7% 和 15.4%。这说明除相对更实用的研究领域之外，研究机构也开始认识到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致力于挖掘非典型研究领域。中国的拉美研究虽然发轫于历史研究，但拉美历史研究和现实需求的关联度不高，因此一直不温不火，当前所占比重为 12.4%。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拉美研究的领域不断向外扩展，甚至法律（0.9%）、艺术（2.2%）、宗教（2.2%）、人类学（3.1%）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的关注。新人、新机构和新领域在学术生产上具有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即刻带来研究成果的变化，但可以想象，未来拉美研究的成果必将更加宽广和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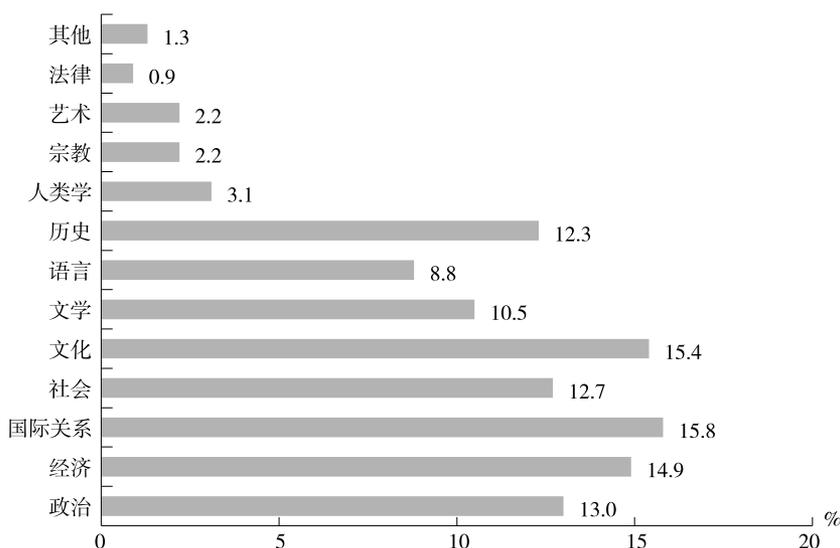


图 15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五）机构活跃度相对不高，成果推介意识有待增强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不断加速发展，但机构的学术活跃度相对不高，成果或活动的对外传播意识也普遍较低。调查发现，有接近 60% 的机构平均每年仅举行一次学术会议，举行两次学术会议的机构占比也只有 30%（见图 16）。举办学术会议、探讨学术问题是研究机构最重要的职能活动之一，学术活跃度不足显然无益于机构学术氛围的营造和培养。不过，这或许是因为如前所述许多机构没有年度预算或者经费相对有限，抑或机构人员不足，难以举办一定规模的学术会议。

相对于学术会议，学术讲座显然更加便捷，成本更低，因此更容易执行。如图 17 所示，有 44% 的拉美研究机构平均每年举行 4~6 次学术讲座，甚至有 22% 的机构活动次数更多：有 12% 的机构活动次数在 10 次及以上，有 10% 的机构活动次数在 7~9 次。学术讲座的次数相对增多对于拉美知识的传播是非常有益的，但同时也反映出许多新设机构有过度依赖这种学术形式来刷“存在感”的嫌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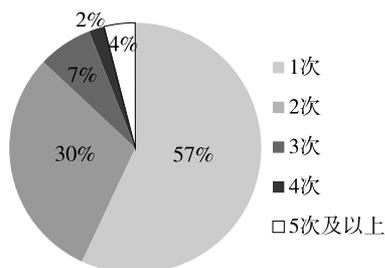


图 16 受调查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
每年举行学术会议的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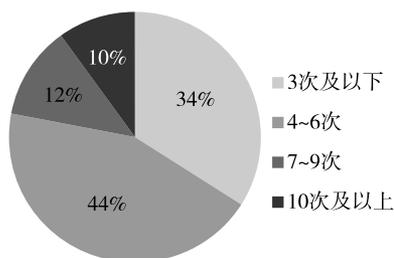


图 17 受调查的中国拉美研究机构
平均每年举行学术讲座的次数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年。

尽管学术活跃度相对不高，但令人欣慰的是科研机构的学术成果并不少见。受访的 53 家拉美研究机构（考虑到其中许多机构是近几年成立的），不仅科研成果总体表现良好，成果表现形式也相对多样（见图 18）。根据统计，53 家拉美研究机构共申报各类学术成果 504 篇/部，平均每家机构 9.5 篇/部。其中中文论文 302 篇，占比 59.9%；外文论文 120 篇，占比 23.8%；专著 30 部，占比 6.0%；译著 25 部，占比 5.0%；编著 27 部，占比 5.4%。但比较令人生疑的是，外文论文多达 120 篇，这是一个与常识不太相符的数字。进一步了解发现，一些新成立的拉美研究机构直接聘用拉美学者做研究人员，或者邀其做 3~12 个月不等的访问学者，聘用或访问期间的学术成果计入研究机构的年度成果。专著和编著的数字略高，也令人生疑。据了解，其背后原因仍然主要是上述情况的存在，但也包括前些年成果正好集中在 2018 年出版，以及一些拉美研究机构对拉美学者的考核相对宽松，对其成果形式不像对国内科研人员那般严苛，以致编著成为重要的成果表现形式。

如果按年均学术成果数量对机构进行细分的话，可以发现学术成果在不同机构间的分布是极其不平衡的（见图 19）。统计表明，2018 年度科研成果总量在 10 篇以上的机构共有 13 家，占全部受调查机构的 24%；而有 22 家机

构 2017 年度的科研成果量在 5 篇以下，占比 42%。甚至有 7 家机构 2017 年度的学术成果为零，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机构大多是近两年才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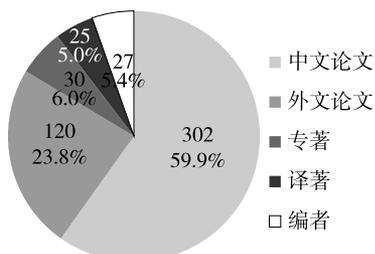


图 18 2017 年度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科研成果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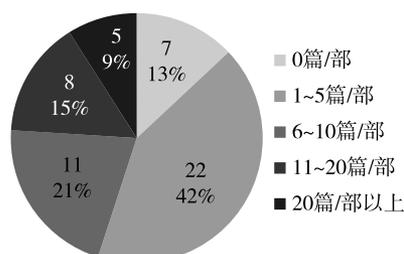


图 19 拉美研究机构的分类：
按年均学术成果量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和注重修“内功”不同的是，大多数拉美研究机构不注重炼“外功”，即机构学术品牌的塑造，以及学术活动或学术成果的对外推介。调查发现，有 42 家机构，占受调查总数的近 80% 没有定期出版物（见图 20）。不过相对于更早时期，目前已有 11 家机构有定期出版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调查同时发现，有近 2/3 的机构没有官方网站——在信息时代，网站无疑是一个机构的国际名片。和网站相比，社交媒体平台更加流行，事实上从各个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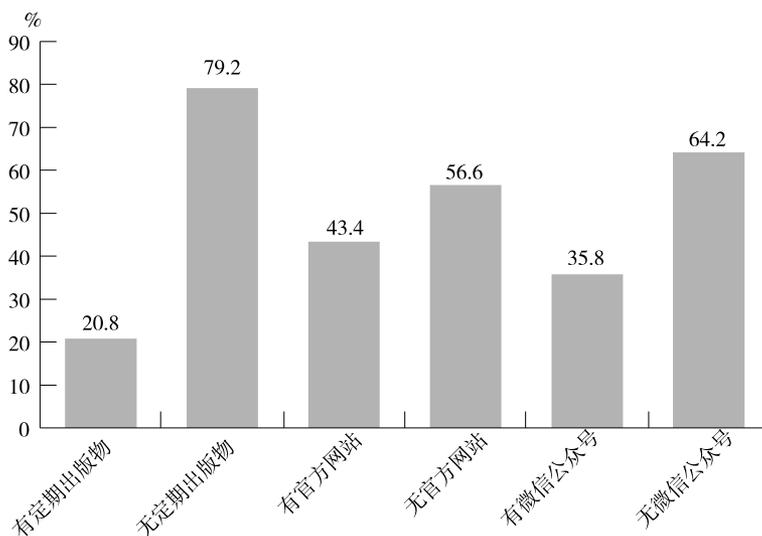


图 20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的学术品牌塑造和成果推介

资料来源：《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 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2019 年。

面来看也都更加便捷。理论上而言,当前国内最流行的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应当成为一种主流的活动发布或成果展示平台。然而和这种臆断相反,仅有19家机构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占比只有35.8%,而2/3以上的受调查机构没有微信公众平台。既有微信公众平台,又有官方网站的“双有”机构仅有13家,占比24.5%;与之相反,接近一半(47.2%)的机构属于“双无”机构:既没有微信公众平台,又没有官方网站。

(六) 学科发展高度失衡,国别研究分布不均

尽管从各机构申报的研究领域来看,政治、经济、文学、文化和历史都保持了相当的关注,甚至宗教和艺术也都有一些机构涉入,但这种研究意向和实际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这里谨以《拉丁美洲研究》(包括改名前的《拉丁美洲丛刊》)为样本,系统分析1979年创刊迄今刊登的全部学术论文^①的研究领域分布。如图21所示,按照中图分类法,在《拉丁美洲研究》上刊登的学术论文接近80%是关于经济和政治(含国际关系)的,其中经济类论文发表量排名第一,计1339篇,占比43.7%;政治(含国际关系)类论文,计1123篇,占比36.7%;以历史类为主的论文共有335篇,占比10.9%。除此之外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虽然也占有一定比重,但总体来看,数量偏少。这种研究目标和实际研究成果的分布存在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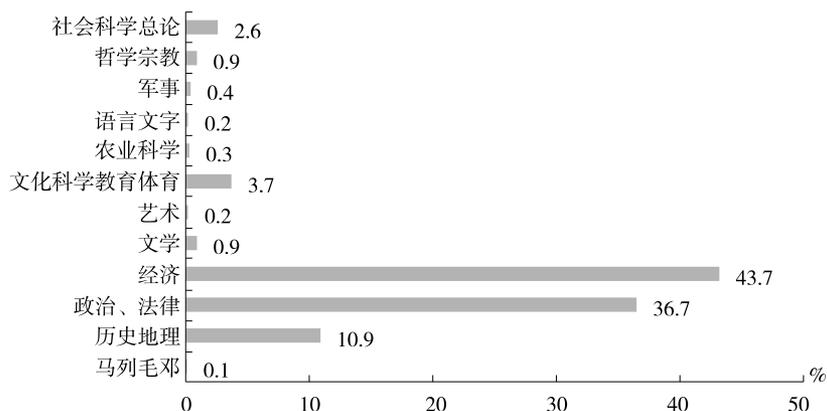


图21 《拉丁美洲研究》刊发的学术论文分类：按研究领域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对《拉丁美洲研究》期刊(1979—2019年)的整理统计。

^① 从1979年11月到2019年7月《拉丁美洲研究》(1979—1985年名为《拉丁美洲丛刊》)共发表3658篇文章,扣除会议综述、新闻稿或各种资讯动态共597篇,学术论文合计3061篇。

的偏离，个中原因或许主要有二。其一，目前的拉美研究机构大多数是最近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成立的，目标领域的设定相对于实际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二，这同《拉丁美洲研究》期刊的定位有关。尽管在前半期，该刊也间或刊载涉及拉美文化、宗教、哲学，甚或文学的论文，但中后期已经主要从一种人文社会科学杂志转向了社会科学杂志。许多新成立的，甚至包括成立较早的拉美研究机构在创建“新型智库”的方针指引下，也大都青睐研究直接满足现实或政策需要的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议题。

从研究所涉地区或国别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布不均（见图 22^①）。整体来看，自《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创刊以来，刊登的学术论文几乎涉及所有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无论国家大小，无论是否同中国建交。首先，地区问题是关注的首要焦点。该杂志刊登的全部学术论文中，有超过 55%（即 1697 篇论文）是讨论地区性问题的。其次，国别研究高度倾斜于三大国：即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占比分别达到 11.1%、9.4% 和 5.1%，涉及论文分别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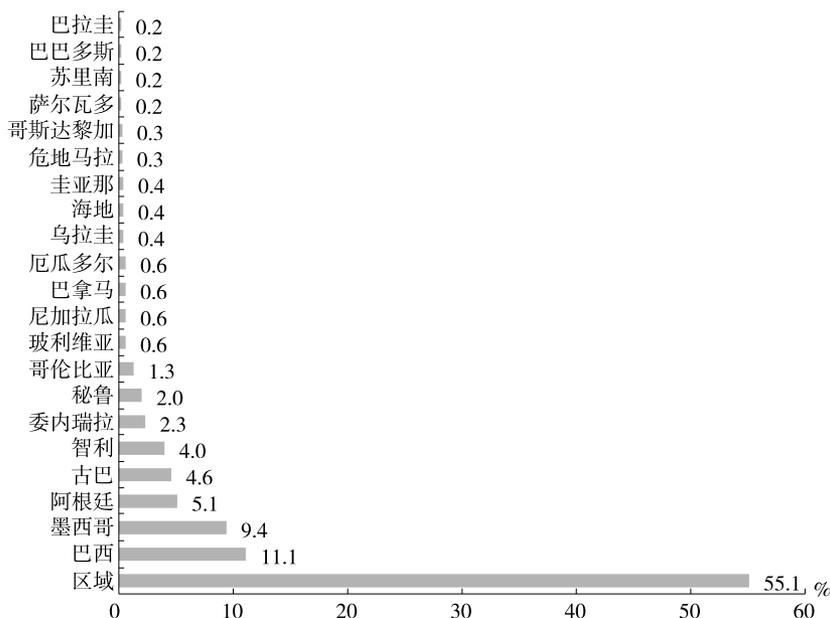


图 22 《拉丁美洲研究》刊发的学术论文：按国别/区域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对《拉丁美洲研究》期刊（1979—2019 年）的整理统计。

① 个别国家所涉论文数量过少，不具统计意义，未在此图上显示。

341篇、290篇和158篇。最后,还有一些国家的关注度也获得显著提升,比如古巴、智利、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关于这些国家的学术论文比重在2.0%~4.6%之间。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同中国关系更加密切或者更具研究价值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比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以及巴拿马等国。

三 中国拉美研究的转型挑战

《中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调查(1949—2019年)》表明,受政府政策和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双重驱动,中国的拉美研究特别是近40年来在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如此,这种进步仍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拉美研究的需求:无论之于当前中国对拉美的政策需要,还是对于中国企业走进拉美的运营需要,抑或是中国公众对拉美的知识需要。这种差距反映出拉美知识的生产一方面存在数量上的绝对不足,另一方面又因重复生产而出现相对过剩,由此对中国拉美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转型挑战。

(一) 研究视野的转型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一直服从和服务于两大目标,一则对拉政策决策,二则“以资镜鉴”。也就是说,尽管后者具有部分知识生产的功能,但同样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这种“从中国来,到中国去”的线性思维本质上有沦为“自我中心主义”的危险,以致“某些观察和结论更像是我们学者的臆断和希望,而不是基于深入了解后的所得”。^①而在研究实践中,囿于视野所限,还存在一种将“拉美问题化”和将“问题拉美化”的趋向。

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视野也亟待随之改变。首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拉美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强,由此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聚焦于拉美地区本身,也愈来愈聚焦于拉美的利益相关方。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拉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成为拉美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利益

^①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2页。

相关方，由此引起研究中国的机构以及研究拉美的机构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中国问题研究和拉美问题研究在“中国和拉美”问题上找到了交汇点。国际上一些致力于中国研究，甚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著名学术刊物频出“中国和拉美”特辑，更不用说一些关注拉美研究的学术刊物拿“中国和拉美”大做主题文章了^①。这种新的变化要求中国的拉美研究亟待走出“中国”，加强与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国际同行的横向交流与对话。中国的拉美研究唯有在地理和思维上走出“中国”，才能为对拉政策提供更好、更优的决策智慧，同时也能创造公共知识，以满足新时期中国社会对拉美研究的迫切需要。

当然，这种“走出中国”，并不是不要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而是要以更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关照中国的拉美研究，即从世界出发到达拉美并最终回到中国。在新的研究框架下，拉美首先是全球视野中的拉美，其次是拉美视角中的拉美，最后才是中国视角中的拉美。正基于此，中国的拉美研究要有融通中外，特别是融通中西（中美、中欧等）和中拉的学术新视野，注意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经验，同时秉承本国的学术传统及自主和创新精神，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学术体系。

（二）研究方法的转型

受地理距离和财政资源的限制，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无法实现“方法上的在地”^②，研究手段主要依靠信息文献分析——诚然如此，信息文献也一度成为稀缺资源。在新的时期，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全速推进，信息文献已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挑战。从旁观式研究到参与式研究或是即将到来的转变。

^① 比如，美国《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2年3月出版特刊《从长城到新大陆：21世纪的中国和拉美》，德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2012年第1期出版特刊《拉美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丹麦的《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6年出版特刊《世界秩序变革年代的中拉关系》，新加坡的《问题和研究》（*Issues & Studies*）2017年第1期出版特刊《中拉关系的政治经济分析》和《海外华人杂志》（*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2017年第2期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中国移民：历史和现状》，美国的《拉丁美洲地理杂志》（*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2018年第2期出版特刊《中拉关系的新地理》和《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2019年第2期出版特刊《中拉关系 2.0》，墨西哥的《网络产业竞争与监管杂志》（*Journal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in Network Industries*）2019年秋季出版特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中国对拉美基础设施的投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澳门巴西研究杂志》（*Macau Journal of Brazilian Studies*）2019年出版特刊《中国在巴西和拉美的经济治理：在政策转换和新兴范式之间》，等等。

^② 杨昊：《东南亚区域研究的技艺：新生代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方法解放论》，载《亚太研究论坛》（台湾）第54期，2011年12月，第131页。

拉美研究有其作为区域研究的本质特性，那就是语言和在地化。尽管对全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的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掌握了拉美地区的两种主要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仍有将近一半的研究人员只掌握英语。事实上，单纯的英语能力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挑战，甚至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拉美研究学者。语言本地化是实现研究在地化的基本条件，在拉美地区更是如此。因此，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掌握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应以语言为利器，鼓励更多的拉美研究人员走向拉美前线，通过跟踪观察和感同身受的参与式研究，获取一手的体验和一手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将田野发现同传统的文献分析相结合并辅以深厚的理论分析，以尽可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借此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研究人员正确地认识拉美、研究拉美，而且其呈现给社会的研究成果也将是一个更加真实、客观、多元的拉美。

然而，在地化通常需要庞大的资源和时间支撑，在现实中很难普及。作为拉美研究之典范的美国虽然迄今都以在地化为主要路径，但也采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辅助措施。美国的“拉美研究是北美人‘与’拉美人一起做的而非‘为’拉美人做的产物”^①。从这种经验出发，笔者认为在地化的一种重要补充路径或是将拉美的中国研究同中国的拉美研究实现有机的融合，构建一种学术上的新型互助合作关系。当前，受中国崛起和中拉关系密切的双重作用，中国研究在拉美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愈发受到关注。但和中国的拉美研究一样，拉美的中国研究也面临类似的“在地化”问题。面对共同的挑战和高度的互补性，中国的拉美研究和拉美的中国研究完全可以通过交流、分享和协作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一则可以推动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二则又潜在地创造和培养了中国的拉美研究伙伴。

（三）研究内容的转变

鉴于政策导向是中国拉美研究发展的总特征，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拉美研究始于拉美历史，却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甚至并不罕见的是，拉美历史专业毕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新机构就职后也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研究。事实上，全国拉美研究机构发展状况的调查结果印证了我们的想象：拉美研究高度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三大传统领域，这三项通常

^①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24. 转引自韩琦：《美国高校拉丁美洲研究与教学的经验：一个区域研究的范例》，载《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4期，第136页。

被视为和中拉关系密切且直接相关的“有用之用”。

和中国相比，作为拉美研究之典范的美国，其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化，甚至愈发关注“无用之用”。以美国拉美学会（LASA）的官方刊物《拉美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为例，在 2017 年发表的 45 篇学术论文中，有 58% 集中于人文科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42% 集中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其中文学和文化研究成为近年来最突出的研究领域^①。而《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虽然号称“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创刊早期也一度刊登过拉美文学类的研究论文，但近期反而更加聚焦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现实性问题。当然，这或许与其更新的办刊宗旨有关，即“主要刊载有关拉美地区和中拉关系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热点问题及前沿问题的开创性、突破性科研成果”^②。

正是在政策导向和快出、易出成果的驱动下，拉美研究在内容上存在普遍的相对失衡。总结来看，大致可以归为“十多十少”：即区域研究多，国别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大国研究多，小国研究少；应用研究多，基础研究少；热点研究多，冷门研究少；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现实研究多，历史研究少；“有用”研究多，“无用”研究少；碎片性研究多，系统性研究少；单学科研究多，跨学科研究少。事实上，这些“多”和“少”的背后都反映出当前的拉美研究充斥着浓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过分注重实用性研究，而忽略基础性的学术研究。然而，值得警醒且业已被印证的是，没有足够雄厚的学术积累和基础知识支撑，就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深刻的政策建议。换言之，“注重学术意义和为政府提供好的政策建议之间本身不应该是矛盾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③

在新的时期，随着拉美研究队伍的扩大，特别是新生研究力量的学科背景更加多元化，拉美研究的内容也必将在未来出现多元化趋势。但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靠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自觉自为，另一方面靠学术刊物（比如《拉丁美洲研究》）和学术团体（比如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积极引导。

^① Aníbal Pérez - Liñán, “Report from the Editor (2018)”,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53, No. 3, pp. 425 - 428. <https://doi.org/10.25222/larr.635>. [2019 - 07 - 11]

^② 《拉丁美洲研究》期刊简介。 <http://ilas.cass.cn/xsqikan/qkjianjie/>. [2019 - 07 - 11]

^③ 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1 期，第 14 页。

(四) 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拉美研究

经过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拉美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也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面向新时代，服务新时代。“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状态、发展趋势、发展愿景，与世界潮流同向同势，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中国深刻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深刻影响着中国。”^①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对拉美研究的需求会更大，要求会更高、更指向未来。面对新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拉美研究机构 and 学者亟待转变观念和思维，以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大力加强基础研究，既为“厚积”学术素养之谋，又为“薄发”政策研究之用。

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拉美研究要实现深刻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尽管经过前50年的碎步前进和后20年的疾速发展，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摆脱这个阶段——高精度地服务于国家对拉战略的政策需要尚需时日，知识生产的使命道阻且长。而告别这个初级阶段恐怕至少仍需两三代人的积极作为和主动转变。就目前而言，面对挑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转型亟待先行，以成为这一宏大转型的先导。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拉美研究团体，面对拉美研究的“井喷式”发展，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或许喜忧参半：为“蓬勃发展”而喜，为“野蛮生长”而忧。面向新时代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未来需要做的恐怕不止是将其宗旨从“团结”转向或者附加“服务”和“引领”职能，而要以切实的行动帮助越来越多的新兴研究机构跨过转型期，助其从数字上的“有形”力量转变为真正的生力军。这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未来告别初级阶段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同心：《论新时代》，载《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1/01/c_1123923778.htm. [2019-06-26]